

2. 文献回顾

历史学家、海外华人史开拓者之一，王赓武教授，曾提出有关印尼华裔独特性的言论。他表示，由于印尼华人所遭遇的政治时局及经济冲击是其他东南亚华人从未体验过的经历，故造成印尼华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Wang, Gungwu, 1976）。此次研究针对印尼华文报纸对该特殊群体的身份重构作用进行探讨，故以下将主要针对印尼华人身份重构、身份族群认同、族群媒体等相关研究进行探讨。

2.1 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内涵、原因及动力

1966年至1998年期间，印尼政府对华人实施“去华化”的强制同化政策，强行关闭华校，禁止华人使用其民族语言、庆祝其传统节日等。通过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进行打压、歧视和污名化的华人政策，迫使华人为了生存彻底抹去自身的中华文化特性并放弃其华人身份认同，全面融入主体民族。此事导致印尼新生代华裔失去其民族身份及文化认同（叶丽萍，2019）。

华人的身份认同不止依据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取向，也包含其身为印尼公民身份的划分（云昌耀，2012）。英国学者 T.H. 马歇尔将公民身份定义为“国家的正式成员”，且由公民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三大要素构成。Zamudio则认为公民身份包括公民法律身份、公民权利的行使和公民意识这三方面（引用自 De la Paz, 2004）。而已拥有印尼正式法律身份的华人是合法的印尼公民，应享有符合印尼宪法的各种公民权益，其中包括实施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力，保留并传承自己民族的语言及文化。许多在印尼的华人或与当地人结合，或选择定居于印尼，他们选择于1949年至1955年期间正式入籍，成为印尼正式公民的印尼华人。彼时印尼政府还未实施“去华化”政策，而中国政府于1955年正式取消双重国籍政策后（叶丽萍，2019），越来越多的华人正式入籍印尼，而这些人自然选择印尼为其国家认同。而印尼华人作为一族群，即拥有仅属于自己的文化。加之一些历史原因，其拥有特殊的种族阶级认同（王赓武，1994）。

为了持续保持、更新或重新构建相对独立的文化特性，以捍卫及争取现实的公民权益，故需要进行“再华化”，重构印尼华人的社会多重认同（叶丽萍，2019）。

何谓“再华化”？中美欧与东南亚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欧美学者将曾因国家政权及主流社会压抑的华人特性，如今得以重新展现（语言、文化习俗等），并被国家当权及主流社会接受的现象称为 *resinicisation* 或 *re-Sinification*，并将其翻译成“再汉化”、“再中国化”。而东南亚研究华人问题的学者则将其翻译为再华化，意指仅保

留中国传统文化，而无当代中国或中国国家认同（吴益婷，2020）。马来西亚学者云昌耀将“再华化”定义为：“以某种华人性的本质概念（如儒家思想）为基础，重新燃起对文化“根源”的兴趣。”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使命”（*Cultural Mission*），因“再华化”主要由老一辈华人发起，他们认为有责任将华人文化传递给年轻一代华裔来传承（云昌耀，2012）。

苏哈托政府将华人贴上非原住民的标签，将其当作国家问题，试图将对华裔的歧视与压迫合法化。即使1966年后出生的华裔除明显的外表种族特征外，其生长背景与一般原住民并无不同，却仍被视为“外来者”，在国家遭遇危机时，总被当作“替罪羔羊”遭到迫害。而“1998年的五月暴动中的华人受害历程，唤醒了华人至今仍存疑的认同”（云昌耀，2012）。

2.2 华人身份认同理论

斯图亚特·霍尔表示，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存在”的问题，而是“成为”的问题，“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身份经历不断地转变，超越空间和时间。文化认同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过程当中。故对文化认同的问题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变成了“我将是什么样的”“将来我要到哪”（Hall, 1996）。因此，印尼华人的自我认同并非绝对，其认同，无论是自我认同或文化认同总与政府所下达的政策挂钩（Dawis, 2010）。

“新秩序”期间，印尼政府对华人实施的同化政策，实为单一文化主义（*Monoculturalism*）政策，使1966年后出生的华裔失去其华人特性，特别是华人文化的特性。“新秩序”后，政府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华人可以在公开场合展示其华人性，例如政府取消华文出版物禁令，将华人春节设为国定假日等。云昌耀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将人划分到各种同质性且单一的文化群体（即刻板印象），可能增加族群间的隔阂，因其群体界限明显又不变（云昌耀，2012）。

Hogg 认为，社会认同理论是人们将自己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类别或群体，以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Hogg & Reid, 2006）。Kivisto 则声称“种族本质上是界限”（Kivisto, 2017），这些界限是精神和文化层面上的，而并非身体上的。族群边界是由成员归因于自己本身，并认定相关的文化特征；换言之，文化特征“被认为是他们族群独有的”（Wimmer, 2008），并且可以“强化”他们的集体身份”（Smajda & Gerteis, 2012）。然而，这个界限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渗透”或“改变”，种族界限是可以改变的，也可

以发生文化交融 (Kivisto, 2017)。云昌耀也赞同该观点, 他表示族群认同的维系取决于对该界限的维持, 而非内部的“文化素材” (云昌耀, 2012)。

Gans 则认为, 现代有关种族的认知是基于身份的符号和感受。根据他的说法, 当人们“从行动转向感受民族, 强调身份而不是实践文化与参与其组织”时, 民族性是象征性的 (Gans, 2017)。因为认同感和这些感觉的表达是成为种族的主要方式, 所以种族高度依赖于符号的使用, 这些符号是种族群体身份的标记, 用于构建和维护设想的种族边界。而语言身为符号的一种载体, 故也是种族群体身份的一种标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 汉字进行书写是直接感知自身“华人身份”的重要媒介。王爱平认为, 有能力书写及阅读汉字, 意味着能直接接触与感知中华文化, 因“方块汉字凝聚和沉淀着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及华人的“思维方式”, 因此汉字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象征 (王爱平, 2004)。

Suprajitno 则提出, 华人身份是基于民族制度、传统和仪式、语言、侨民社区、以及流行文化的兴趣组成 (Suprajitno, 2020)。他指出, 通过华社及华校加强民族身份意识, 保留民族语言、文化习俗, 能加强自身的华人身份认同。而庆祝民族节日, 举行传统仪式或习俗也是实践和维护种族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 通过关注海内外的侨民讯息, 了解并分享华人社区内的消息, 获得身为华人的归属感。Dayan 和 Katz 曾提出, 电子媒介, 如电视能创造即时历史, 成为观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Eric Kit-wai Ma 对香港电影进行研究发现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集体记忆和想象力的一部分, 例如香港武侠电影的流行, 造成包括印尼华人在内的华人社区接触并重塑民族认同 (引用自 Suprajitno, 2020)。

云昌耀编写的《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一书针对印尼华人“华人性”有具体化的描写。首先“华人性”可区分为华人族群外部认知与华人族群的内部认知。因此论文主要探讨华人自身认同, 故仅描写华人内部对“华人性”的具体描述。首先, 通过外貌 (肤色、五官等) 来收集华人性线索。其次为口音。由于棉兰、坤甸、山口洋等地的华人仍使用华语方言做交流, 故拥有明显口音。然后是最重要的华人价值观: “节俭、刻苦、坚韧不拔、敬老、尊师重道、儒家伦理、人本精神”等 (云昌耀, 2012)。

云昌耀最后总结, 印尼华人的华人认同十分复杂, 有时可以说自相矛盾。印尼华人性有弹性, 会依照在地的条件、现代全球化形式有所变动, 故可根据巴斯 (1993) 描述的“失序、多样性、及未决的观点” (云昌耀, 2012)。

2.3 印尼年轻华裔身份认同

经过长达 30 年的同化政策，印尼新一代华裔大多已然失去其华人性。

“新秩序”后期及结束后（1995 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华裔，虽然有更大机会接触华人文化，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受西方甚至其他东亚文化（日韩）的影响，而不再亲近自己的民族文化（Christian, 2017）。

与“新秩序”前或期间出生的老一辈华人不同，印尼年轻华裔没有直接感受到来自政府及社会的打压歧视。他们大多是通过老一辈的讲述来了解这些事实。他们从小接受印尼国民教育，视印尼为自己的祖国，并对其怀有正向感情（Hutapea, 2020）。他们称自己为印尼华人（*etnik Tionghoa Indonesia*）而非华侨（*Orang Tionggok Perantauan*）。

对于经历过“新秩序”的老年华人而言，“支那”（*Cina*）是怀有歧视及贬低意味的名称，他们更偏好以“中华/华人”（*Tionghoa*）称呼他们。但年轻华裔不介意其他族群称他们为“支那”（Setiawan, February 4, 2019）。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中印尼两国开展越来越多的合作，包括印尼华人在内，许多印尼人开始选择学习华语。这些年轻华裔选择学习华语的原因大多是出于未来的职业规划，而非抱着自己是华人，必须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的想法去学习华语（Wicaksana, September 24, 2023）。

当然，不是全部年轻华裔都失去了其作为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例如移居印尼的第一代至第三代华人家庭，上一代接受过华文教育，自小与父母使用华语交流，“生活在大中城市或其附近的小城市，家庭从事工商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年轻华裔。他们有的前往中国学习华语，怀抱着“是华人就应该学习汉语”的想法（王爱平，2004）。当然，一些印尼年轻华裔也仍不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Christian, 2017）。

2.4 华语媒体的作用

荷兰殖民时期直到印尼独立初期，华人报刊指的是混杂着华语方言的马来文出版品（也称为侨生华人报刊）以及华文出版品（云昌耀，2012）。新秩序时期由于“同化政策”，除仅有的政府发行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这一华文报纸外，其余华文刊物均遭禁止，而如今，华文媒体便特指以华人为主要传播对象，以华语为传播媒介的媒体，是维系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主要工具。

根据 Suprajitno 的说法，基于种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心理建构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边界是通过种族的显著性和持久性来创造象征性，而媒体通过塑造身份的公共空间促进了符号和表现的创造；因此，华文媒体的作用是重构印尼华人的华人身份（Suprajitno, 2020）。

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印刷资本主义是民族概念的基础理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也是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它以使用印刷机产生的相同语言和话语出现，由资本主义传播市场。资本主义企业家用当地语言（而不是专有文字语言，如拉丁语）印刷他们的书籍和媒体，以最大限度地流通。结果，说着各种当地方言的读者可以相互理解，形成了共同的话语（Anderson, 2006）。

约翰·B·汤普森曾提出，以媒体作媒介保持文化延续及民族认同的概念。他表示，离开祖籍国的侨民可通过媒体传播的象征性材料保持文化的连接性。换句话说表示，媒体通过传达符号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即使远离祖籍国，也能保持文化延续的传统方式（Thompson, 1995）。即可得出，通过华文媒体传播华人文化，是华人保持华人性的方法。

肖航提出海外华文报纸“软传播”的概念，即在尊重当地受众文化和社会环境差异的基础上平等进行的族裔文化传播理念。以新闻传播真实性为原则，为当地民众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流通服务，此外应为传播中国文化、展示真实的中国为己任（肖航，2013）。

2.4.1 印尼华文媒体人的初衷

华文媒体最初是在海外奋斗的华商的一种“华文情节”。他们在海外希望能够阅读自己熟悉的文字，与自己的祖籍国有所链接，故开始创办华文报（李奇，September 23, 2003）。

大多华商的办报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在如今华文报纸处境愈发艰难的当下，仍有华商愿意“自掏腰包”资助华文报纸继续下去。一些媒体人也是如此，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华文报纸的发展鞠躬尽瘁。例如曾担任《千岛日报》的评论员莫非。他身为印尼华人，完全站在印尼公民的立场。通过《千岛日报》宣扬民主改革及爱国理念，表现印尼华人及华文报纸的立场，即印尼华人亦是印尼公民。在与原住民“同舟共济”、“殊途同归”为基础，怀着对印尼这个国家未来的关心与热爱，为华人争取平等的权益（莫非，2002）。

还有印尼《新报》的主编李卓辉，其身为一位老媒体人，接手办报初衷为“表达华人心声，传递来自祖籍国的消息”的老华文报纸《新报》。2018年顺应时代将起发展为电子报纸，希望通过新的传播介质让印尼华人乃至全球华人更好地感受到祖籍国的发展变化(贾建京, June 28, 2021)。

李卓辉认为，华文媒体在印尼主流影响较弱，语言问题是阻碍华文媒体发展的最大难题，而破解该难题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华文教育(中国新闻网, September 2, 2017)。他希望华文报纸能跻身主流媒体当中，向当局传达华人的愿望和华社的呼声；促进恢复华人历史上本来面目，消除当地人对华人的偏见(郑昭贤, June 19, 2017)。

2.5 先前研究

印尼华裔通过去华化及再华化适应主流社会，但其身为印尼合法公民，享有保持华人的文化特性及族群认同(叶丽萍, 2019)。同化政策导致华裔失去其文化身份特征，现通过复兴华人社团、华语教育及华语媒体进行身份重构(王赓武, 2011)。

华人身份认同包括文化与政治认同。其中，包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王赓武, 1994)。而大众传播媒介起到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并形成族群特性。华语报刊有着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颜春龙, 2006)。

而印尼华文报纸也是起初受19世纪末泛华人民族主义崛起所启发而开始。经历复苏的华人认同意识，故“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叙述华人故事或有关中国的事”(Suryadinata, 1978)。华人报刊(华人开办的印尼语报刊)的内容大多包括商业利益、理想主义及政治意向等，故在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媒介崛起前，“华人报纸是集聚权利的工具，不仅记载正在发生的事，更在那个时期主动介入华人社会的记叙和发展建构”(云昌耀, 2012)。

“新秩序”结束后，华文报纸再次崛起，许多华文报纸将自己定义为“华人文化的守门人”，将复苏华语教育、支持华社为己任。大部分印尼的华文报纸便以复兴提倡华文教育及中华文化，力保他们不从印尼社会消失为目标(云昌耀, 2012)。

2.6 理论框架

由肖航提出的“软传播”概念为基础，本着跨文化的传播理论，表示海外华文报纸应摆正自身的角色定位。首先应为传播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讯息为本；其次在尊重受众文化和社会环境差异的基础上为当地华人服务，以发扬中华文化、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服务华人(肖航, 2013)。

此外，华文媒体还承担教育并引导华裔后代继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华文报纸除继续担任华人的“喉舌”外，也应以重塑年轻华裔的“华人性”为己任。此次研究，将以云昌耀提出的华人价值观的描写为基点，加上 Suprajitno 提出的华人身份组成理论，用以论证《千岛日报》对泗水年轻华裔的华人身份重构所采取的策略。